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亚太教育研究
ISSN(O) : 3080-2148
ISSN(P) : 3080-213X
2026 年第 3 期

解码与重构：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挑战与对策

鲁薇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思想象征与历史印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这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符号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党内文化生产、传播与运用的过程中，红色文化符号在“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展开了编码、传播及解码的双向互动。但是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党员干部认知与践行的双重偏差、符号话语体系与传播生态的双重短板等问题，阻碍了其在政治建设中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必须强化红色文化符号的政治教育效能与优化其传播机制。这有助于“编码者”与“解码者”深刻领会红色文化符号内涵，从而推动党牢牢把握红色文化的符号话语权，构建红色理论与话语体系，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动力。

关键词：解码与编码；红色文化符号；党的政治建设；挑战；对策
DOI：https://doi.org/10.62177/aper.v2i3.1466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予以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提出了“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1]等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要求。因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将红色文化打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所聚焦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突出的先进文化形态。正如霍尔所说，文化是通过文化符号来表达和传递意义和观念，而文化符号则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即“编码”、“传播”和“解码”的过程。编码是将信息转化为符号，解码则是将符号转化为意义。霍尔强调，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涉及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党

作者简介：鲁薇（2002-），女，黄冈师范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无。

内情况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已然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因此本文从编码与解码视角出发，探究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红色文化符号在编码、传播、解码各环节中的意义重构过程。

二、红色文化中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红色文化积极的学习者、实践者与倡导者，更是红色文化符号核心的编码者、传播者与解码者。在意识形态建构中，“没有符号，也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建构；放弃符号分析，也就意味放弃意识形态研究。”[2] 由此区分出“物质符号”与“非物质符号”两类红色文化符号，并剖析红色文化符号中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路径，有助于掌握红色文化符号的话语权，进而切实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与领导权。

（一）红色文化符号及其象征

物质符号以物质形态承载红色文化思想，是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红色文化的物质符号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在重大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实体性红色文化符号。如遵义会议旧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是红色文化符号兴起的源头见证，承载着历史记忆与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是用以记载与传播红色文化的文字类、声音类、影视类以及其他多种物质表现形式的符号。这些记录了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重大事件和人物事迹，广泛传播红色文化，促进其在大众中的普及与弘扬。以黄冈地区为例，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的红色物质符号资源极为丰富。红安县七里坪革命旧址群、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董必武故居等遗址遗迹，以及《董必武传记》《李先念文集》等红色文献，均为红色文化符号的本土化呈现提供了坚实载体。

非物质符号以观念、规则、行为方式等非物质形态承载红色文化内核，构成内在规范体系。红色文化的非物质符号包括红色文化精神符号与红色文化制度符号。首先，精神符号涵盖思想、价值、道德等层面。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排精神、小岗精神，以及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种子精神等为红色文化注入新内涵。其次，制度符号从顶层设计和组织运行层面确立了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与要求，凭借其权威性确保红色文化得以传播。如土地政策，明确土地分配原则、对象与方式，激发了农民革命热情，诠释了红色文化公平正义、人民解放理念。在此过程中，制度凭借其规制效力和导向作用，使红色文化持续传播，从而为红色文化构建起基础架构，保障了红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得以延续传承。

（二）红色文化中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过程

红色文化符号依靠符号体系的内在逻辑进行意识形态的自然符号化过程。在符号学的理论中，符号可拆解为能指与所指两个关键要素，“能指是信息的外在样态和物质载体，而所指是信息背后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者被广泛认可的意义。”[3] 符号化则是将特定的事物、现象或概念转化为具有特定表意功能的符号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意义赋予与形式塑造，使其能够在符号体系内进行传播与交流。如“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作为红色文化物质符号，能指便是园内的纪念建筑群本身，包括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革命历史纪念馆、烈士纪念馆以及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等实体建筑与陈列设施；所指代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政权的光辉历程，体现了“不胜不休”的大别山革命精神。依据符号体系的既定逻辑，那些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元素，如革命事迹、英雄人物、历史事件发生地等（能指），很自然地与背后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理念、艰苦奋斗精神等意识形态（所指）相结合，形成被认知和接受的红色文化符号，使人们在接触这些符号时，能理解、感受并传承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符号依靠编码者的内在目的进行意识形态的非自然符号化过程。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符号是任意的。”[4] 黄冈红安的“红安苕”在最初阶段，能指是红安苕这一物质实体，所指是革命战争年代红安百姓赖以生存的口粮和红军将士的“救命粮”。然而符号的意义并非停滞不前，“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5] 在编码者的积极编码下，红安苕被赋予了远超其初始内涵的丰富意义。红安百姓将赖以生存的红苕献给红军作军粮，自己则以树皮草根充饥，这一实践被赋予在党的领导下老区人民甘于奉献、军民同心坚守革命的深层意义；红安苕的‘傻气’实际上被升华成为老区人民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境界；红安苕从“救命粮”到“致富宝”的产业振兴之路，被升华成新时代乡村发展中弘扬大别山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标志。借助湖北日报、红安网、高校宣讲团等多种传播渠道与手段，编码者把老区人民甘于奉献、大别山精神、乡村振兴战略等深层次意识形态融入其中，改变了红安苕原本单纯的农产物和战时物资意义上的“所指”，构建起一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和思想引领价值的符号。

三、解码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面临的挑战

红色文化符号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其传播涉及编码者、符号本身及解码者等要素。一方面传播过程中符号自身具有复杂性、抽象性，解码者难以对符号进行精准的解读与有效的内化，进而在传播链条中形成意义传递的阻碍。另一方面传播过程并非孤立存在，环境作为重要的影响变量，干扰解码者的判断与信息接收。

（一）党内红色文化传播中党员干部认知与践行的双重偏差

党员干部对红色文化符号接纳主体性的缺失。中国共产党员因在政治架构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依据其知识、信息量、见解、经验及社交等方面的优势根据对象的不同再经过相应的加工整理为受众帮困解难，并主动为受众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从而使受众在沟通中获得指导和帮助。”[6] 但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接纳主体性缺失问题。一方面传统红色文化符号传播模式单一，削弱党员作为‘意见领袖’的接纳主动性。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语境下，传统红色文化符号传播模式单调僵化，难以契合现代多元文化与新媒体生态，缺乏新颖性与吸引力，导致党员难以在接受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从而使接纳红色文化符号的主体自觉意识与能动能力趋于弱化。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内部“意见领袖”引领红色文化符号传播与深度解读的力量不足。一些党组织内部的领导干部未能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在红色文化符号学习与传播活动中，缺乏积极主动的引导、阐释以及示范。党员群体在缺乏榜样带动和深入解读引导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对红色文化符号的强烈共鸣和深度认同，从而在接纳过程中表现出主体性的缺失。这一状况不仅在微观层面阻碍了党员群体个人政治素养的提升与历史使命感的培育，而且在宏观层面制约了红色文化符号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性转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广泛传播。

党员干部红色文化实践转化与行为彰显的失位。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在红色文化符号内涵的深度挖掘方面存在欠缺，未能切实从政治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与精准把握。同时，部分党员干部为简化工作，忽视受众多样性，采用单一化、程式化传播模式。如对年轻党员仍沿用传统理论灌输，难以调动其积极性，导致传播效能差异，阻碍了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深入系统的传播进程。此外新媒体环境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方式迭代升级，而部分党员干部暴露出短板。以党建新媒体平台如公众号、学习强国 APP 为例，部分党员干部局限于简单的文字信息的接收与推送，未充分利用新媒体特质传播红色文化。在互动性建设上，运用新媒体开展互动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使教育活动吸引力不足；在可视化呈现上，内容创作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现象，缺乏兼具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在即时性方面，尚

未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导致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的时度效有待加强。这些均导致红色文化符号在新媒体语境下难以达到党内传播目标，制约其创新驱动发展与传播效果优化。

（二）党内红色文化传播中符号话语体系与传播生态的双重短板

红色文化符号话语体系建构的缺失。从传播学视角出发，罗杰斯将在组织中的传播定义为“发生在组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其环境间的传播。”[7] 但目前学界对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的语义生成机制、话语权力构建逻辑以及传播效度提升路径等关键环节，尚未形成系统且可行的研究成果。这导致红色文化符号话语体系建构在实践中缺乏科学的理论框架指引，难以对传统话语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阻碍了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传播力与影响力的提升。其次，各地域红色文化分散，整体规划缺失也成为制约红色文化符号话语体系建构的因素之一。我国丰富多元的红色文化资源因地域广袤，呈现出地理分布上分散的特征。在缺乏整体规划与统筹协调机制的背景下，各地在红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话语表达实践中各自为政。这导致红色文化符号话语内容碎片化、重复化，难以构建整合性、权威性与系统性的话语体系，阻碍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体系的转型。以黄冈为例，红安、麻城、英山等地的红色资源虽各具特色，红安与英山、麻城等红色遗址之间可进一步加强跨县域的符号联动与联合传播规划，以逐步形成更具合力的话语体系。

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生态中氛围的失衡。“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8] 首先，全球化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传播，西方文化凭借经济、科技优势传播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与红色文化符号形成竞争。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市场中，多元文化符号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分散了党员对红色文化符号的注意力。党员在多元文化的包围中，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解码与认知受到干扰，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生态中的地位与作用面临挑战，传播氛围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对其传承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则是破坏红色文化符号氛围的另一外部因素。历史虚无主义势力通过歪曲党史、国史、军史等手段，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恶意歪曲与重构，传播不实信息，侵蚀其传播根基。在党内组织传播的层级架构中，一旦错误信息在党员群体中广泛传播，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将降低，进而导致红色文化符号氛围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生态中陷入失衡。

四、重构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应对策略

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语境下承载着厚重的政治语义与文化内涵。为使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发挥效能最大化，需要从内在的教育维度与外在的传播维度双向发力，深度挖掘并激活其潜在的政治教育价值与广泛传播效能，进而构建起坚实稳固且富有活力的政治文化支撑体系。

（一）强化红色文化符号的政治教育效能，提升党员的主体自觉

树立优秀榜样与党内政治文化的教育融合。首先，优秀榜样具备成为“意见领袖”的潜能，需对其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党的历史经验教育，使他们在思想层面升华，站在更高政治立场与理论高度审视红色文化符号，为其传播赋予深刻内涵与理论支撑。这将更好引领党员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共鸣、行动上践行，从而拓宽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其次，优秀榜样的事迹可以作为鲜活、具有感染力的实时教育素材。这些事迹承载着榜样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场景下对红色文化的坚守与践行，是红色文化精神的生动诠释。将其融入教育过程，无论是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党员干部的培训课程，还是在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普及活动中，都能以一种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呈现红色文化的魅力。以黄冈地区为例，黄冈市组织“老兵情怀·铜锣回响”大别山精神巡讲队进校园活动，结合抗美援朝老兵事迹宣讲红色精神。活动现场反响热烈，许多师生表示被老兵故事深深打动，部分党员代表在交流中表达了“要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和学习”的决心。这表明

榜样事迹的鲜活呈现能够有效激发党员和群众的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这有助于拓宽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体现了榜样事迹在教育融合中的独特价值。

实现红色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对接。红色文化符号与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对接的核心在于实现能指与所指的对接。红色文化的能指涵盖了从物质实体到精神象征的广泛范畴，这些能指以其独特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表征，将党内政治文化所指的政治理念、价值导向以及行为规范等予以生动展现。通过红色文化能指的直观表达，党内政治文化所指的内涵在具体历史情境、人物事迹及文化符号中得以彰显。这将会使党员更深入地理解党内政治文化核心要素的实质与要求，增强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与践行。同时，党内政治文化的所指对红色文化的能指具有强化意义。党内政治文化所蕴含的理论体系、政治目标以及价值取向等所指内容，为红色文化能指赋予了更为深邃的政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内政治文化使得红色文化能指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历史记忆或文化现象，而是被提升至政治文化高度，具备了更强的思想引领性与教育示范性。在党内政治文化所指的加持下，红色文化能指的含义得以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促进红色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二）优化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机制，完善党内红色话语体系

强化红色文化符号与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渠道的协同。“议程设置的基本含义是大众媒介经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着公众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知。”[9] 因此党需要将红色文化符号定为主流媒体传播议程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借助系统的传播战略布局与精细的内容管理机制，挖掘其内涵中契合党理念的部分，转化为高传播价值的议题并适时向党内受众推送相关内容，引导深度解读与认同建构，从而确立红色文化符号在舆论场的权威地位。同时，红色文化符号的网络动态传播为党的新媒体议程设置提供新动能。为顺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和受众需求变化，党应积极调整传播策略。内容上，将红色文化符号与新媒体多元表达形式深度融合，提升在党内新媒体受众中的触达率与影响力；平台上，强化党内新媒体与社会主流媒体的协同联动与资源共享，拓展传播边界与渗透能力。以黄冈为例，市融媒体中心在全媒矩阵开展红色文化传播，2025 年 6 月起连续 4 个月开设专栏，推出作品 780 余篇，全网阅读量突破 500 万人次；“黄冈发布”微信公众号及“云上黄冈”客户端协同联动，构建起立体化传播格局。这一全媒协同矩阵使红色文化符号触达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显著提升了内容的传播广度与用户参与度。这说明通过多平台联动、矩阵式传播，能够有效提升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影响力。

构建红色文化符号与党内政治文化制度的互动机制。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制度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保障功能。一方面，构建传播组织架构，明确中央制定宏观战略、地方细化落实的层级职能，形成上下贯通的传播体系。另一方面“组织传播分为正式传播和非正式传播”[10]。正式传播（如党内文件、培训、宣传）确保红色文化符号的准确性与权威性。非正式传播（如同志交流、红色文化活动）则以灵活、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弥补正式传播的不足。两者在制度协调下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的传播效能最大化。其次，红色文化符号也在党内政治文化制度的完善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一方面，其政治导向与价值规范能强化党员对党的政治目标、理想和纪律的认同，为制度完善奠定根基。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有助于优化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为成员讨论制度提供共通话语基础，促进组织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推动制度吸纳集体智慧。以黄冈为例，在正式传播方面，红安县将大别山精神融入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中，通过落实首位督查、定期抽查等机制，抓实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确保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在非正式传播方面，红安县“亲·听”青年宣讲团亦定期进校园、进机关开展红色故事宣讲。上述表明构建正式与非正式协同

的传播体系，并辅以层级化的组织架构与反馈机制，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组织中的传播效能。

本文从“编码——解码”视角出发，分析了红色文化符号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符号化逻辑、面临挑战及应对路径。研究表明，红色文化符号在党内传播中存在认知践行偏差、话语体系缺失与传播生态失衡等困境。为此，可从政治教育与传播机制两个维度入手，推动正式与非正式传播协同。但本文主要基于理论分析与局部实践观察，缺乏系统的实证调研，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补充实证数据以深化相关认识。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J]. 党员之友 (新疆), 2021(11): 4–7.

[2] 胡国胜 .《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 20.

[3] 隋岩 . 群体传播时代 : 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18(11): 114–134+204–205.

[4]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0: 10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9.

[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 113–115.

[7] 埃弗雷特・罗杰斯 .《组织传播》[M]. 陈昭郎 , 译 . 台北 : 台湾编译馆 （ 中国台湾地区 ）, 1983: 1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92.

[9] 黄旦 .《传者图像 : 新闻专业主义建构与消解》[M].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5: 217.

[10] 陈力丹 . 组织的内外传播 [J]. 东南传播 , 2016(03): 23–27.